

第六章 唐宋时期广西的海路贸易与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随着东洋航路、南洋航路的开辟和拓展，两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贸易空前繁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除传统的丝绸和黄金外，瓷器的输出和贸易异军突起，成为畅销海外的重要产品。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更是将我国瓷器在东西方世界的行销路线称为“陶瓷之路”。北部湾地区沿岸的陆上交通枢纽、运河码头、生产作坊、管理机构、商贸集散地等重要遗存，是海上贸易背景下文明交流与交融的特殊产物。

一、唐宋时期的海路贸易格局

自东吴以来，积六朝的连续发展，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超过了两汉水平，随之带来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

（一）陆路的衰落和海路的兴起

唐代前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唐朝统一后，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两汉以来对外陆路交通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统一、繁荣、空前强大的“开元盛世”。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大食灭波斯后，阿拉伯帝国版图据有亚、欧、非三大洲，国力强大，贸易繁荣，并极力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陆上丝绸之路联系了当时世界上东西方两个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迅速发展至鼎盛时期。但这个“黄金时代”好景不长，至唐代中期便骤然衰落。

该转折点的出现，主要缘于战争和国内动乱。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于怛罗斯（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与大食之战败北，在西域的威德急降。755~763年，国内爆发“安史之乱”，朝廷遂将驻守在西疆四镇的边防守军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侵占河西陇右。此时，回鹘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自此，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也因而陷入“道路梗绝、往来不通”的境地。

陆上丝绸之路也存在诸多限制商贸发展的因素。陆上丝绸之路只能通达毗连邻国，若再向远运，便要穿越一连串的国家或民族聚居地，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变乱或垄断都会影响全线的畅通。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远离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产区，加之沿线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且只能靠骆驼运输，装载量有限，成本高昂。而且，环太平洋各国中的很多国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是无法到达的。随着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商品外运与日俱增，瓷器等较重且易损坏的商品，陆上运输难以承担。

反观海路，这些不利因素多可克服。其一，我国海岸线漫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和海港城市，从这些港口出发，海路几乎能到达陆路所至各国，而且还能到达陆路所不及

的诸多海岛和国家。海路也不像陆路那样易受到别国牵制，可以越过发生变乱或操纵丝绸之路的国家，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操纵，曾于东汉延熹九年（166年）遣使通过海路直接与汉朝交往，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唐代中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大大增强，我国的造船能力已居世界之最，造船工场遍布全国各地。东南沿海既是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的生产基地，又是造船、航海最发达的地区。其三，商船的运载量也比骆驼之类运输工具的大，且相对运费低廉，安全可靠。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商品运输发展的需要，日渐凋敝。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衰落，朝廷转而重视和加强对海路贸易的管理，如设置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市舶税，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海路贸易的发展。宋代积贫积弱，从立国之初便面临北方辽、金政权的严重威胁，以及西方西夏政权的阻隔，几乎无法经略陆上丝绸之路。“南渡以后，国土日蹙，一切倚办海舶”，经济重心南移，出口商品的供给地移至东南地区，更是促使商品贸易由陆上转向海上的一次巨大转折。^[1]

（二）唐宋时期的海路贸易格局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新航道的开辟，唐宋时期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格局亦为之一变，东洋航路在与高丽、日本的贸易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与南洋航路并重的主要航线。

1. 东洋航路

唐宋时期，在东北亚地区，即中国的山东半岛、长江口和东北沿海诸口岸，朝鲜半岛诸口岸，以及日本列岛诸口岸特别是本州与九州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规模庞大的海洋贸易网络，有学者称之为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北路网络。沟通这一贸易网络的路线，一般称为“东洋航路”或“东海丝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之一，呈网络状沟通了中、朝、日三大民族，促进了东亚地区总体文明的进步。^[2]

贾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详细记述了从中国登州港启航到朝鲜的全部航线和航程。^[3]新罗王国与唐朝长达280年的交往中，双方使节往返共计161次，绝大多数循海路来去。当时新罗王国对唐朝的海上交通，北至山东半岛，南至长江一带。至宋代，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载，由明州（今宁波）乘南风，顺利时不过五日即可到达高丽。天圣前与高丽间的交通路线由登州人，自熙宁以后基本上限于明州入。

早期的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航路，亦循此航线，掠朝鲜半岛，越对马、壹岐等岛屿而到达日本。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出海求仙药，船队可能已抵达日本。日本福冈地区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明确反映了两汉时期中日之间的海上往来。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访华，更呈现了海上交通的规模化、密集化态势。自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后，开辟了自我国南方各海港城市如扬州、苏州和明州启航，越东海至日本的新航线。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

缩短了航程，并且促进了日本与中国南方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进行友好的宗教传播和贸易往来。此后，中日友好使节和商旅往来于明州至日本的东洋航路，不绝于（海）道。

贸易方面，唐代主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新罗派往长安的遣唐使常向中国输入麻布、人参、金银、毛皮和工艺品等，日本遣唐使带来珍珠、绢、虎皮、玛瑙、水织衣等。

丝织品、瓷器、茶叶、书籍、乐器等物品则是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由于新罗商人来唐贸易较多，在今江苏、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常有新罗人集中居住的新罗坊。唐代晚期，日本不再派出遣唐使，中日间的贸易改由唐朝商人主导。及至宋代，市舶贸易兴起，除官方正式的朝贡贸易外，东北亚地区民间贸易较为活跃。高丽向宋朝进贡金器、银器、铜器、螺钿器、青瓷、丝织品、药材、纸墨、书籍等。宋朝回赠高丽的货物主要有绢、绫、锦、缎等丝织品，还有金银器、瓷器、漆器、礼服、乐器、祭器、茶、象牙、玳瑁、沉香、货币及书籍等。日本向宋朝输出的货物以硫磺、木材居多，另有沙金、水银、锦、药材，以及折扇、屏风等工艺品。宋朝则向日本输出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器、茶叶等。

文化交流方面，新罗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僧侣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诗词歌赋、天文历法、儒释道等文化由此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地区传播，节庆习俗、歌舞演艺、技艺百工、农耕水利等方面也多有相互影响和交流。宋代以后，中国不再具备唐代大一统王权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优势，对高丽、日本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三国之间佛教和儒学的交流仍较密切。

贸易商品贩售流通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技术的传播和交流。瓷器大量流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后，对当地的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罗模仿唐三彩，烧制成了“新罗三彩”，并于10世纪在全罗南道的康津等地设窑，仿造中国越窑青瓷器，这种瓷器被称作“新罗烧”或“翡色”瓷器。12世纪初，高丽受镶嵌漆器的影响，烧制了镶嵌青瓷。日本仿烧的瓷器，不论造型、釉色、纹饰等均与唐三彩较为相似，被称作“奈良三彩”。至9世纪末，日本利用越窑烧制技术改进窑炉结构，爱知县的猿投窑仿制的越窑青瓷，器形、釉色和装饰手法均与越窑产品较为相似。南宋时期，加藤四郎将中国的制瓷技术带回日本，在尾张的濑户建窑，专门烧造“濑户烧”。^[4]

2. 南洋航路

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由中国与亚非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经略的南洋航路进一步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证明了商船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东部横跨南海的这一深海航线已经开通。航线先从广州驶出珠江口，经越南沿海占不劳山（今越南岷港以东之占婆岛）、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之燕子岬）、门毒（今越南归仁）、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

出峡后经婆国伽蓝洲（今印度至尼科巴群岛），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分两道经印度西海岸北上或横渡阿拉伯海直抵波斯湾大食国。从波斯湾口循阿拉伯半岛而行可入红海，折而南下可直至东非（图 6-1）。^[5] 中国商船从广州航行至波斯湾尽头的末罗国（今巴士拉），仅需 89 天。^[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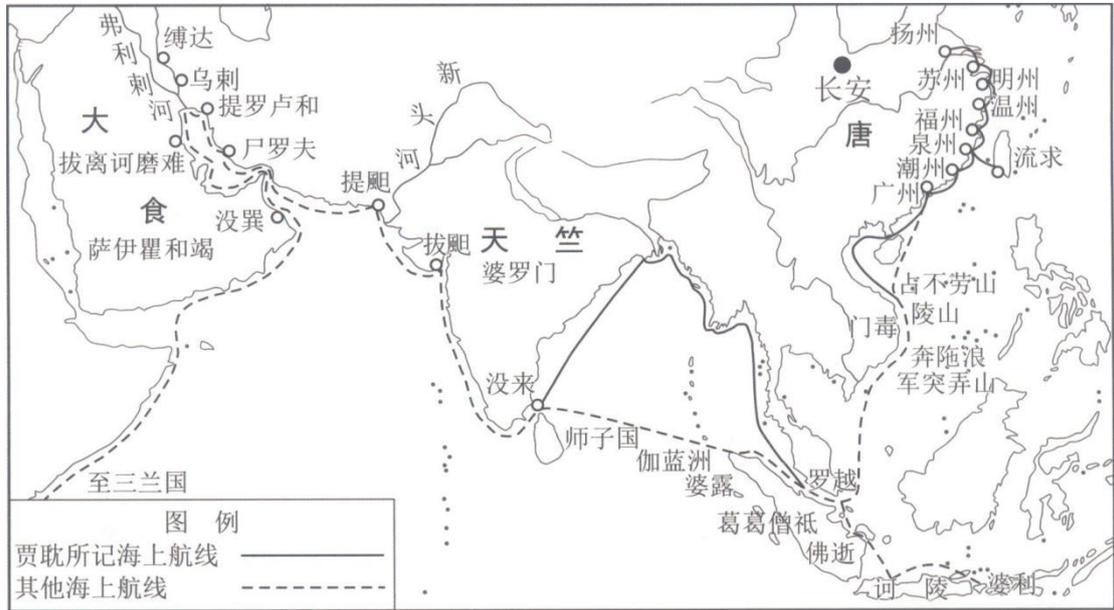


图 6-1 唐代南洋航线示意图

从钦州和廉州西行，便可到交趾进行短途贸易，也可从交趾南下而连接天下。《岭外代答》载：“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7]“六合之外”，即天下也。但钦州等地虽有至东南亚的航路，前往东南亚主要仍由广州和泉州出发，其路线基本上仍沿“广州通海夷道”所记航线。

南海航线上既有官方的朝贡贸易，也有私商经营的民间贸易。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兼事“进奉、纳舶脚、禁珍异”等职能，管理南海诸国互市浮海进贡的“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等。宋代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注犍、阁婆、真腊等。各国所贡之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如交趾、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香料、香木等；大食贡玻璃器、水晶、织锦、香料等。宋朝则常以金器、银器、钱币、丝织品等物品回赐。为更好地管理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及商人出海贸易等，宋朝先后于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江阴军、密州和澶浦等九地对外通商口岸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自建立阿拔斯王朝后，大食即全力加强海上交通，欲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其都城巴格达，由陆上丝绸之路西段的陆路交通中心转而成为海路交通中心。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联系广州和巴格达两大国际大都会的纽带，因此在巴格达设有专卖中国货物的市场，

而广州则有大批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蕃坊”。在东南亚地区，上述航线所经地区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等重要国家控制了东西海上交通的咽喉之地，即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占据了当时中国商船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据点，成为东两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中心。及至宋代，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等同商人和商船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线的改善，中国船只不必在印度转换小船，可从印度南端直航波斯湾。这一时期，中国商船还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进行贸易航行，与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也展开了贸易。据《岭外代答》卷三载，当时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仍以大食最为重要，次之为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再次之为喀拉拉邦南部濒阿拉伯海的港口城市故临（今印度奎隆）。^[8]故临和三佛齐是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必经的两个转运中心，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重要海上中转站。

唐代以前，丝绸和黄金是中国对海外的主要出口产品，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赉黄金杂缯而往”。唐代丝织品仍是政府物产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唐代中晚期以后，瓷器的出口和贸易存海路贸易中异军突起，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华南的青瓷、华北的三彩、邢窑的白瓷成为畅销海外的产品。近几十年来，在东至日本，南至东南亚的婆罗洲文莱、沙捞越，马来半岛上马来西亚所属的彭亨、泰国所属的蓝坡、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口，西至埃及开罗城内的福斯塔特和东非的70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唐代中国的陶瓷残片。中国的瓷器运抵海外港口以后，迅速由当地蕃商通过各种渠道转输其他地方。中国瓷器大量外销的趋势在宋代以后迅速发展，海外发现中国宋元至明清瓷器的地点和数量也越来越多，这种世界性的中国瓷器销售网络存在了几乎千年之久。^[9]据《诸蕃志》载，中国用瓷器与东南亚的占城、真腊、三佛齐、兰无里、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西龙宫、闍婆、渤泥、麻逸、三屿，南亚的细兰、南庇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三上次男根据中国外销瓷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发现，勾勒出一条以陶瓷为媒介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10]另外，铜钱、书籍、茶、糖、药材等也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产品。

中国输入的海外产品以香料为主。海外香料输入的历史悠久，汉代文献中已经提到外来的苏合香。南北朝时期，日南和天竺的香木、；罽宾的郁金香、安息苏合香、大秦的熏陆香被四方的商贩们运抵中国。香料进口量日增，使其从奢侈品逐渐成为市井日常的消费品。宋代仅香料税收这一项，最高时竟占整个财政收入的10%。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时期从占城输入泉州的香料就有沉香等七种，共“六千三百三十四斤”，而在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发现的沉船中，各舱均有香料发现，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就达“四千七百多斤”，经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反映了香料贸易的繁荣。^[11]当然，除香料外，纺织品、药物、玻璃、金银器等也传入了中国。

唐宋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海上丝绸之路沟通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唐宋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对越南影响颇深，而丝绸与织造技术、瓷器与制瓷技术、货币，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则通过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杜环《经行记》中记载，被俘到两河流域的中国工匠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这些中国工匠对西亚织造锦缎等高级丝织品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阿拉伯还办起了宫廷作坊和官府作坊，生产“兑拉兹”等供王室和上层阶级使用的丝织品。其后，欧洲所需之丝绸品种，有相当部分取自阿拉伯。至两宋时期，丝织技术又从阿拉伯传入西班牙，再传至西西里和欧洲其他国家。至迟到宋代，爪哇的阇婆国已开始“务蚕织，有薄绢，丝绞”。伊朗工匠亦据唐三彩仿制了“波斯三彩”和白瓷，这些瓷器在内沙布尔、里伊、阿莫勒、阿格罕等地都有发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当地陶瓷，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12]

二、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瓷业经济与对外文化交流

（一）北部湾地区唐宋时期的制瓷业

1. 唐代制瓷业

广西的隋唐窑址发现数量较少，零星分布于桂林的漓江沿岸及北部湾沿海。北部湾地区发现的窑场数量不多，主要有合浦英罗窑址、钦州雅子冲窑址、北海晚姑娘窑址和容县窑址4处，年代均为唐代中晚期。其中，英罗窑址经过正式发掘，它是了解北部湾地区唐代中晚期制瓷业的重要材料。

英罗窑址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村委会驻地东面300米，塘尾水库东西两岸的斜坡上。1993年被列为合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英罗窑址据传原有72座窑，多已毁于水库建设。残存的古代瓷窑主要位于堤坝以南的东西两段斜坡上，东段约长50米，西段残长150米。断面尚可见若干窑炉痕迹，地表发现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器残件、模范、烧土碎块、砖瓦建筑构件等遗物。经发掘，发现与陶瓷生产相关的遗迹有龙窑1座、练泥坑5个及废品堆积。龙窑依斜坡而建，坐两朝东，残存前段（下段）约16米，后段毁于水库溢洪道建设。窑体由排渣道、火膛、窑床等部分组成，窑顶无存。排渣道与火膛连为一体，平面呈漏斗状，全长约3.5米；窑床平面略呈长方形，宽约3米，前端弧收与火膛相连，窑壁砌砖为基础，其上则用烧土块与黏土垒砌。练泥坑处于龙窑南侧废品堆积之下，废品以瓷器为主，另有少量陶器，与模范、窑具、烧土等废弃物混杂一起，堆积最厚处约2米。出土瓷器以青瓷为主，有瓮、罐、壶、盒、盆、盘、碗、碟、盂、擂钵、纺轮、网坠等。出土陶器有釜、瓮、罐、盆、钵、擂钵等。瓷器胎色灰、米白或灰白，胎体厚重，较疏松；釉色多青灰，也有青黄、青褐等，釉面开片；釉层较薄，施釉不均，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常有淌釉、聚釉现象；成型方式基本为拉坯，器底或外壁常有拉坯成型的螺旋痕或细弦纹；饼足多为在外壁近底处向下旋修而成，常留下刮修泥片的螺旋痕和“C”形沟；

多为泥片支钉垫烧，碗盘类器物内底常见4个支钉疤。窑具多见扇形垫饼及捏制的垫坨，匣钵较少。根据器物内外壁沾砂及落灰的情况来看，应以明火裸烧为主。

英罗窑址所烧器物多为唐代中晚期流行的器类。碗类器物饼足为外腹浅挖而成，与广东乳源唐代中期墓葬中的Ⅰ式大敞口碗较为相似；双耳小罐与广州太和岗唐墓CⅡ式罐较为相似。盘、碟、罐、壶、釜等器形多见于广东新会官冲窑、梅县水车窑等唐代中晚期窑址中。因此，英罗窑的烧造时代，也应为唐代中晚期。

雅子冲窑址和晚姑娘窑址破坏严重，根据调查情况，其窑场规模均不大，制瓷技术与英罗窑址较为相似。不论窑炉类型、产品类型或装烧工艺等制瓷技术，皆受到了广东新会官冲窑、高明窑和梅县水车窑的影响。

雅子冲窑址位于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雅子冲村，残存的窑业堆积主要发现于潭池岭和母鸡坑两个地点。目前于潭池岭地点发现龙窑1座，母鸡坑地点发现龙窑及馒头窑各1座。发掘和采集的遗物以瓷器和窑具为主，陶器较少。瓷器均为青釉瓷器，器形主要有多系罐、小多系罐、碗、钵、盘、盆、盂、带流罐（壶）等，潭池岭地点以多系罐为大宗，母鸡坑地点碗、盘类数量较多。其胎色灰白或灰黄，生烧者为红褐色，淘洗不净，常见细小颗粒；胎体厚重，修胎不精，下腹露胎部分刮痕较明显，足底大多留下指捏痕迹；釉色多为青黄或青褐，施釉不均，釉面开片，多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常见聚釉和淌釉现象，多系罐及盆多口部刮釉。窑具有匣钵、垫饼、支钉、支烧台等。陶器主要为多系罐。器物多素面，少数有弦纹。雅子冲窑址的器形器类、窑炉形制、装烧技术等，都与广东唐代中晚期窑址较为相似，年代与之相当，进一步说明了钦州地区窑业技术与广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关系。

容县窑址从器形上看较前述三个窑址稍晚，胎体更趋轻盈，环形足较流行。其釉色青黄或青褐，南于釉料原因，部分釉面有乳浊光斑。釉层较薄，玻质感差，因此支钉选用石英砂类材料，直接置于器物内底，不必刮开釉层，因而亦无“星形”痕迹。在修足方式上，采用细绳勒断，因而底足留有偏心箕形纹。^[13]

北部湾地区尚未发现唐代早期窑址，但从出土隋至唐初陶瓷器来看，该地陶瓷生产技术具有延续性。钦州久隆墓地^[14]出土的陶瓷器多为灰白胎，质地较疏松，以青釉为主，部分青黄；釉面开片细密；施釉方式为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装烧方式为泥片支钉叠烧，内底常留有三四个垫烧痕迹；装饰方法以素面为主，也见有弦纹或模印花卉纹。以上特征在雅子冲窑址和英罗窑址都有继承和发展。虽然从器形、装饰手法上看，这批瓷器与广西桂林桂州窑^[15]隋至唐初产品较为相似，但后者的垫烧具为齿状支钉，留下的垫烧痕迹与北部湾地区差别较大，是区别两地产品的重要依据。从窑炉、器形、胎釉、施釉及装烧方式上看，北部湾沿海唐代制瓷技术都深受广东地区影响。尤其是装烧方式上，开始使用匣钵，该装烧方式也见于粤东潮安北郊北堤头窑^[16]和梅县水车窑^[17]。圆器多用泥片支钉叠烧，

施釉后用块状工具刮去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方块，再贴上圆形泥块作垫烧具，使得内底或圈足上常留下“三角形”或“星形”垫烧痕迹，成为广东唐代青瓷窑系的重要特征。

2. 宋代制瓷业

广西宋代制瓷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据统计，藤县、容县、北流、岑溪、桂平、贵港、桂林、全州、兴安、永福、临桂、灵川、柳城、柳江、武宣、钟山、贺州、合浦、浦北、邕宁、大新、白色、田阳、田东等 32 个市（县）均发现宋代窑址，数量约 57 处。^[18] 这些瓷窑的分布较有规律，形成了以漓江、洛清江、柳江为中心的青瓷烧造区和以西江支流北流河、郁江、武思江为中心的青白瓷烧造区。^[19] 北宋早中期的青白瓷窑场主要发现于浔江流域，罗秀伟杨窑址和桂平窑址发现瓷业遗存较多，规模较大。北流河流域大批青白瓷窑场的兴起，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影响下北部湾地区制瓷业的发展。容县城关窑、北流岭垌窑和藤县中和窑规模较大，窑炉数量较密集，生产的瓷器种类丰富、质量较好，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北部湾地区制瓷业的代表。

(1) 北宋早中期窑址。主要分布于北部湾腹地的浔江流域，以桂平城区为中心，其他散布于罗秀、蒙圩、罗播、社步等乡镇，数量及规模较前期增加，以罗秀伟杨窑址、桂平窑址最具代表性。

伟杨窑址位于罗秀镇伟杨村下庙、马鹿塘和赤泥岭等一带土岭上，南北介于 351 县道与马鹿岭之间 500 米，东西自下庙至赤泥岭 250 米范围内。历次调查采集到的产品有碗、盘、罐、碟、盏、花瓶和瓜棱壶等。窑址中发现的 1 号窑为斜坡式龙窑，从钻探和剖面观察，其形制和规模与城区的桂平窑址接近。从器形上看，伟杨窑址流行的各式叠唇碗、敞口碗，胎釉、器形均与安徽繁昌窑址出土者较为相似，与桂平窑址以撇口碗为主，常见各类圈足较高的碗、盘有所差异。伟杨窑址的胎釉与器形表现出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白瓷器的早期特点，又与桂平窑址存在一定联系，其年代可能为北宋早中期，与桂平城区诸窑址年代相当或稍早。^[20]

桂平窑址北邻黔江，东靠城区，西至西山，分布于桂平城区西部的西山大队一带，传说原有 99 座龙窑。据 20 世纪 60 年代调查，早年因桂平城区扩大，毁去了大部分龙窑，仅剩 12 座。1973 年、1980 年分别在桂平酒厂附近发掘清理了两座龙窑。桂平窑址烧造的瓷器主要有碗、盏、盘、碟、盅、杯、香炉、钵、罐、壶、盒等。其中碗占绝大多数，盘、碟次之。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垫圈、垫饼、器座、垫坨及火标等。窑址中出土了“元符通宝”和“圣宋元宝”铜钱，且碗、盘、碟等多具有厚唇、矮圈足的五代瓷器风格。因此，发掘者认为桂平窑址的年代应在北宋早期至中期之间。^[21]

从总体上来看，该时期的窑炉类型为长度约 20 米的斜坡式龙窑。窑炉结构已较合理，桂平窑 1 号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1 号窑和 2 号窑都有一个加高和加长窑尾的垫底

层，用以弥补台地斜坡不够长的缺陷，通过增加窑炉长度和坡度，提高窑体的装烧容量和窑身的抽力。产品以碗、盏、盘、碟、罐、执壶、器盖、灯等日用瓷器为主。玉璧形圈足或平底无足的圆器、多系罐等器形不再流行。本期器物多为宽矮圈足或喇叭状高圈足，另见少量饼足。由于胎体变薄，卷沿、叠唇、折沿器物较多。新见葵口出筋器。

胎釉方面，本期各窑址胎土洁白细腻，且淘洗较前期精细，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较轻薄，少见气孔，吸水率大大降低。罗秀伟杨窑青白釉泛蓝，桂平窑等釉色白中泛青，或色调偏青灰、青黄等，呈色不稳定。施釉方式仍为器内满釉，外壁蘸釉，下腹及器底露胎。釉层较稀薄，但流动性提高，釉面较均匀，不见前期淌釉聚釉现象；成型以拉坯为主，器形已较规整，器表仍见旋修利坯痕迹。由于胎土强度较低，外壁下腹近底处刮削痕迹明显。带流执壶的流与螯为分开制作后以瓷土粘贴于壶身。器物装饰较少，有刻划、贴塑两种。刻划纹多在器物外壁刻以菊瓣纹（亦称折扇纹）或几道竖线呈莲瓣纹。贴塑主要为灯上的莲瓣装饰。装烧方式为匣钵装烧，多一器一匣，匣钵底部实以耐火砂，圈足垫有支垫圈、垫饼、垫圈等。由于匣钵堆垒较高，为防止倾倒，间以垫坨支撑。

本期窑场大多以烧造青白瓷为主，与安徽繁昌窑、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及广东地区同时期的潮州窑、西村窑关系密切，其制瓷技术亦多受以上窑场影响，产品类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伟杨窑流行的各式叠唇碗，胎釉、器形均与繁昌窑出土者较为相似，其叠唇宽扁，弧腹，内底略下凹，矮圈足，足墙外直内斜，足沿旋削一周，腹与内底交界处有一周弦纹的特征与安徽繁昌窑五代至北宋早中期流行的叠唇碗、盏相似。^[22]这种叠唇碗在景德镇湖田窑五代遗存中亦较为流行，究其原因，应为当时胎土氧化铝含量较低，特用叠唇或“厚唇口”的方式增加其厚度，防止烧造变形或崩塌。^[23]另外，伟杨窑青白釉泛灰蓝，区别于桂平窑青白釉泛青灰、青黄的釉色，而与繁昌窑更为接近。桂平窑址中的常见器形及器壁刻菊瓣纹的装饰也常见于潮州窑、西村窑中，但西村窑产品又呈现出更多元化的仿制风格，在广西地区的北宋早中期窑址中较为少见。

(2) 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窑址。本期窑址发现较多，主要分布于北部湾腹地的北流河及武思江流域，数量多，规模大，制瓷业发展情况以容县城关窑址、北流岭垌窑址、藤县中和窑址为代表。

城关窑址分布于容城镇，东起东郊红光大队缸瓦窑，逆绣江而上经容城镇至西郊湘西大队下沙子及下沙子对岸的上茶村一带，长五六千米，分为东、西两个窑区。东窑区分布于绣江西岸的上窑社公岭顶、上窑屋背山、独墩山、下窑山、下窑社公山等岗坡及东埃等地，而以羊湾河与绣江的汇合口沿岸最集中。东窑区由于造田造地及建房造屋等破坏较严重，现尚可看到沟槽状的废窑炉及废品堆积10余处，废品堆积较厚。该窑区烧制青白瓷，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盒、罐、灯等，以碗、盘为主。碗以卷唇为主。瓷器胎体细

致坚薄，釉匀莹润，多素面。个别盘内壁饰席地缠枝菊花纹，有的碗外壁有菊瓣纹。匣钵外壁常刻划或戳印“张”“张七”“马”“邓”“卢”“八十”“六十”等。西窑区在容城镇西郊约1千米处，东起容县农机厂，西至容县烤烟厂，窑炉及废品堆积相当密集。该窑区烧造的产品以青白瓷为主，还有青绿、黑、褐、红和窑变等色釉瓷器。器形有碗、盘、盏、碟、杯、壶、罐、炉、盒、灯、钵、腰鼓、枕、洗等。瓷器胎体与东窑区相同，更趋轻薄。装饰以刻花为主，次之为印花，花纹主要有海水游鱼、海水婴戏、缠枝折枝花卉、席地缠枝菊花等，有的碗外壁刻划菊瓣纹或莲瓣纹。匣钵外壁常刻划或戳印“李”“莫四”“莫小一”“卢”“王八”“陈七”和“四”“五”等。据该窑区1号窑的发掘情况，出土瓷器均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较为常见的器形。另外，在1号窑窑室内堆积上部还出土有皇宋通宝铜钱。因此，城关窑的年代约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24]

岭垌窑址位于北流平政镇岭垌村，以圩头岭为中心，分布于老虎头山、石梯、缸瓦窑、龙峙、果子湾背等低矮的山丘上。1991年广西文物考古队进行第一次试掘，出土了一件“宣和三年”款印模。1995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一座全长108米的斜坡式龙窑。2015年为配合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再次进行调查，发现岭垌窑残存窑炉19座，圩头岭共发现7座窑炉，按西南—东北向依次分布，另在圩头岭西南发现4处面积较大的烧造废品堆积。据调查，岭垌窑址烧造产品以碗（图6-2:1）、盏（图6-2:2）最多，另有盘、碟、壶、灯、流、洗、器盖、魂瓶、盒等；窑具有漏斗形匣钵、筒形匣钵、垫饼、支烧具、火标等。出土印花模具12件，其中有纪年的7件。窑址烧造的器物都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常见的器形，根据“宣和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十年”“乾道三年”“淳熙二年”“开禧丁卯”“庚戌年”“嘉定元年”等纪年铭文印花模具，该窑址的年代应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25]



1. 青白瓷模印菊花双鱼纹碗



2. 青白瓷斗笠盏

图6-2 岭垌窑址出土的宋代瓷器

中和窑址位于藤县县城南约15千米的藤州镇中和村北流河（又称绣江）东岸，主要分布在中和村南起芝麻坪、北至黎山口的北流河沿岸的9个小山丘上。1975年进行试掘，清理斜坡式龙窑2座，采集各种瓷器1000余件。中和窑址烧造产品有碗（图6-3:1）、盏、

盘(图6-3:2)、碟、杯、壶盒、罐、瓶、钵、枕、灯、腰鼓等,而以碗、盏、盘、碟为主。其中一件飞鸟花卉印花模具,背面刻“嘉熙二年戊戌岁春李念龙参造”年款,为中和窑址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瓷器器形、纹饰和钱币来看,中和窑址年代约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26]



1. 青白瓷葵瓣高圈足碗



2. 青白瓷葵瓣盘

图6-3 中和窑址出土的宋代瓷器

以上三处窑址具有较强的共性和时代特征,反映了北部湾地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制瓷技术水平。^[27]

该时期窑炉类型皆为较长的斜坡式龙窑。容县城关窑2号窑,全长26.4米,坡度约17.5度。窑身由火膛、窑门、窑床、烟道组成。而1号窑在2号窑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残长达42米。窑室后部增加了挡火墙,南侧有4个侧门,其上有投柴孔。装烧方式延续前期的一器一匣,垫饼、垫圈、支垫圈形制多样。为防止倾倒,匣钵柱间以垫坨分隔同定。根据匣钵外粘垫坨尺寸观察,本期匣钵柱间距较前期更窄,仅5厘米左右,反映了该时期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器形以碗、盏、盘、碟、盒、罐、灯、堆塑瓶等较为多见。该时期既有第二期延续发展的撇口碗、凸唇碗、圈足盘、瓜棱罐等,又有斗笠盏、折腰碗、折腰盏、堆塑瓶、腰鼓等较具时代特征的新器类。折腰碗、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圈足;二为无足,平底稍内凹,底心无釉呈“隐足”状。该时期器形较为规整。由于追求轻薄的效果,器壁多极薄,为保持平衡下腹、内底稍厚,圈足稍高。斗笠盏内底心由小圆圈变为小圆点,腹壁斜直,重心不稳,因此圈足较厚,呈饼形或浅挖呈假圈足。折腰盘、盏下腹几乎与内底同高,有圈足者圈足较其他圆器高。

胎釉方面,胎土洁白细腻,淘洗匀净,烧制精细,胎体更趋轻薄。青白釉呈色佳者泛湖蓝、天青、粉青,也有白中泛青、泛灰、泛黄者。铜红釉、酱褐釉为该时期新出现釉色,主要发现于容县城关窑址。施釉方式仍为手抓器底蘸釉,平底者施满釉后旋修刮釉,防止粘黏。该时期施釉较满,圈足露胎较少。釉层较厚,遮盖胎体旋修痕迹,器内模印纹饰者也有因此而漫漶不清。

装饰大大增加,模印、刻划及贴塑十分流行。模印多在内底、器壁印海水游鱼、海水摩羯、折枝花卉、缠枝花卉等,虽纹饰繁缛但布局合理。刻花多于灯、碗、器盖外刻莲瓣

或菊瓣纹；划花主要为篦划纹，常与模印纹饰组合出现。

以上三处窑址皆受景德镇湖田窑系的强烈影响，产品类型、装饰技术及风格都与之较为接近。但未出现覆烧工艺，也体现了窑场间技术交流与制瓷传统之间的关系。北流河流域窑场的大量兴起，出现在西村窑衰落之际，其中是否存在西村窑窑工的迁徙或窑场的转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容县城关窑址，瓷器品种较丰富，铜红釉、窑变釉、黑釉等产品具有模仿其他名窑产品的特点，与西村窑较为相似。

武思江流域的浦北土东窑址与北流河流域诸窑址风格差异较大，制作风格总体趋向草率，又不见时代特征显著的折腰盘、盏，反映了广西青白瓷窑的晚期特征。其技术来源较为复杂，既有广东地区五华龙颈坑窑址延续西村窑、潮州窑瓷器的特征，又体现了与福建地区汀溪窑系的联系。

另外，英罗窑址地层中出土的凸唇斜直腹圈足碗、敞口斜弧腹小圈足碗、莲瓣纹碗及外壁刻菊瓣纹的敞口碗等青白瓷器，胎体轻薄，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釉质较莹润。装饰工艺有刻划及模印两种。瓷器上已不见泥片支钉叠烧痕迹。其制瓷技术与唐代相比较为精湛，具有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青白瓷的烧造技术特征。虽然目前合浦地区尚未发现宋代窑址及相关遗存，经过与北部湾腹地及广东地区同时期窑口的比较，仍可以认为这批瓷器为合浦当地烧造。

（二）北部湾地区唐宋时期的陶瓷贸易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不仅勾勒出了海上贸易的路线网络，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意识和反映的人文交流，也对生产地和输入地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北部湾地区的陶瓷考古工作，也将有助于深化北部湾沿岸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研究。

1. 唐代的陶瓷贸易

由于历年的破坏，广西的唐代遗存发现较少、保存情况较差，考古工作开展亦有限，加之窑址材料公布较少，瓷器的流通与贸易情况仅能通过相关研究窥其一二。

雅子冲窑址产品主要发现于钦州地区的钦江故城、高沙遗址、马骝滩遗址、下红泥沟等遗址中^[28]。钦江故城是南朝至唐初安州及钦州州治所在，贞观年间移治灵山后，延续使用至唐代中晚期。城内出土的陶瓷片中，发现内底有四个泥片支钉痕迹、外底有手指捏痕的器底、残饼足、罐残片等青瓷残片。高沙遗址、马骝滩遗址、下红泥沟遗址于调查中发现了若干青瓷多系罐及碗等。以上陶瓷器的器形、胎釉和烧造工艺均与雅子冲窑址发现的一致，应是该窑址产品无误。

雅子冲窑址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瓷器手工业作坊。据《钦州志》载，隋唐时期钦州地区人口较少，“仅二千七百余户，人口一万一百四十六”^[29]，而烧造的瓷器量远远超过当地的需求，其产品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运销外地。窑炉紧依大风江东岸的坡地而建，既节省

产品出窑时间，又便于充分发挥烧造效率，瓷器产品可以十分便捷地利用大风江运往北部湾沿海及内河各地。

英罗窑址产品的流通范围较雅子冲窑址稍广，不仅发现于合浦唐墓中，防城港怪石滩、玉林博白等地亦有发现。北海唐墓中出土的四系罐，直口，溜肩，肩部四个桥形横耳，椭圆腹，大平底；施青釉，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30]从器形及工艺上看，是英罗窑址唐代中晚期的产品。在防城港怪石滩的水下考古中，出土了英罗窑址的青瓷碗、青瓷四系罐等^[31]。其中，青瓷碗敞口微撇，斜弧腹，矮饼足；青瓷四系罐圆唇外凸，束颈，溜肩，肩上桥形横耳，二者灰白胎，施青釉，外壁釉不及底，釉面开片，足底有“C”形沟，是英罗窑址产品的重要特征。

容县窑址和晚姑娘窑址由于资料较少，流通情况尚不明朗。据周华、李铎的《广西唐代青瓷窑的兴衰》一文介绍，桂林开元寺及其他招提寺、山水寺等几处唐代寺院遗址曾发现四系罐、碗、盘等容县窑址瓷器残片，据推测是由游僧或商旅者携带经水路而来。^[32]有关晚姑娘窑址产品流通情况，可靠资料更少。

越南出土的9~10世纪青瓷碗（图6-4:1）、青瓷六系罐（图6-4:2），不论器形、胎釉及烧造技术都与两广沿海地区的青瓷窑场产品非常相似^[33]。青瓷碗敞口、圆唇、斜腹，是雅子冲窑、英罗窑、广东新会官冲窑等常见的器形。灰白胎、青黄釉，釉不及底，内底有6个刮釉的泥片支钉等，都是两广沿海窑场的典型特征。目前虽不能确定其产地，但就交广两地的密切交往来看，极有可能来自两广沿海地区。



图6-4 越南出土的9~10世纪瓷器

目前在海内外沉船或港口、城市遗址中发现的外销瓷器，见诸报道者不仅有数量庞大长沙窑、越窑等著名窑口的产品，另有若干“广东青瓷”。这些“广东青瓷”除确认为若干会官冲窑、水车窑、高明窑等的产品外，尚有部分难以确指其窑口。^[34]在外销瓷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北部湾沿海唐代瓷窑亦仿烧广东地区的外销瓷产品，其中英罗窑烧造的瓷

器的器形器类、胎釉等方面都与新会官冲窑产品极为相似。英罗窑产品除满足北部湾区域内的需求外，很可能进一步参与了海路贸易。那些海外遗址中尚未能识别具体窑场的“有星状图案的广东青瓷”中，可能就有北部湾沿海窑场产品。

从现阶段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北部湾区域范围内的陶瓷贸易较为频繁。唐代的陶瓷产品主要在北部湾区域范围内进行贸易，以满足当地需求为主。用于外销的瓷器数量较少，可能有途经北部湾转船内地或海外的游僧或商旅者购买。

鹿耳环江为注入钦州湾的独流入海河流，主要流经钦州犀牛脚镇，于鹿耳环村附近注入钦州湾。2009年当地村民在入海江口挖沙时，出土了一批唐宋时期的青瓷碗、盘。^[35]这些瓷器不仅有雅子冲窑场烧造的，还有广东地区窑口的唐代中晚期青釉褐彩瓷盘（图6-5）。该瓷盘为敛口，弧腹，大平底，饼足稍内凹，盘心褐彩绘莲瓣纹，内底残存4个泥片支钉叠烧痕迹。这种青釉下施褐彩的装饰方法在唐、五代时期较为流行，广西周边的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均有发现，但以泥片支钉垫烧的工艺则主要见于广东及广西北部湾地区。从雅子冲窑址、英罗窑址的制瓷技术看，尚未发现该类釉下彩产品，且胎釉、支钉材料均有较大区别，应是广东地区窑场生产。



图 6-5 青釉褐彩瓷盘残片

北部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唐代仍是东南亚、南亚诸国来中国朝贡及佛教僧侣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途经北部湾转船内地的游僧和商旅者遗留下的孔雀蓝釉波斯陶器，还勾勒出了一条过去鲜为人知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

孔雀蓝釉波斯陶，又称“波斯陶”或“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产自伊拉克巴士拉，在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日本的都市或海港遗址都有发现。在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福州、扬州、明州、桂州（治今桂林市）、容州（治今北流市）、广州等地，都发现有波斯陶器。从唐代开始，特别是8世纪以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迅速提高，中国沿江、沿海各大港口的商业贸易也随之日趋繁荣，出土伊斯兰釉陶器的地点，均为9~10世纪水陆贸易通道上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的港口城市。^[36]

1989年以来，桂林、容县、柳州陆续发现唐代中晚期的波斯陶片。与波斯陶片伴出的大多是邢窑、越窑、长沙窑和广西当地窑口瓷片。广西出土的波斯陶片虽来自不同个体和部位，但皆属瓶的残片。容县政府工地出土的40余块残片，其瓶底基本完整，矮圈足，

底满釉，足底有支烧痕，根据残片推测瓶高超过 50 厘米。口沿下至肩部有扁条双耳痕迹，肩部环饰联珠纹、并列弦纹、网格纹和水波纹，腹部有弦纹和堆贴捏塑花边等装饰，器形与 1965 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一件完整波斯釉陶双耳瓶相似，只是腹部更趋瘦高，更接近公元前 4 世纪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墓葬中出土的希腊银匠制作的双耳银酒瓶造型。桂林市保安总公司工地出土的残片，与扬州出土的双耳瓶较为相似。^[37] 2015 年柳州正南门城墙遗址还出土了波斯陶壶的器底残片（图 6-6）。^[38]



图 6-6 柳州正南门城墙遗址出土的波斯陶壶器底残片

广西出土的孔雀蓝釉波斯陶瓶与扬州及泰国、马来半岛等地发现者，并非中东地区的贸易陶瓷，可能为盛装货物的储运容器。过去认为唐代阿拉伯商船多在广州港停泊，商品从广州至扬州，再北上至洛阳和长安。其中由广州出发沿西江至广西梧州，再溯桂江、漓江北上经桂林至兴安，通过灵渠入湘江至长沙，然后经洞庭湖溯入长江达扬州至京师的路线较为人所知。根据广西地区波斯陶的发现情况，马文宽在《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提出，阿拉伯商人也可能在北部湾的合浦港停泊，经由南流江北上至玉林，走陆路再入北流河至容县、梧州，再经水路北上至桂林，再由桂林前往内地。^[39]

2. 宋代的陶瓷贸易

由于广西的宋代遗存发现较少，目前尚未见到出土罗秀伟杨窑、蒙圩顺东窑和浦北土东窑产品的报道，而北流河流域是广西青白瓷窑场的集中分布区，其中北流岭垌窑、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等几处青白瓷窑场规模较大，窑炉数量多、烧造时间长，烧造的瓷器质量较好，除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外，产品流布范围较广，桂北桂林旧城、临桂钱村遗址、河池，桂西百色阳圩营盘遗址、横山寨旧址，桂东贺州钱监遗址等均有出土。

桂林是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及至宋代，由北部湾经桂林沟通广州、扬州、京师等国内重要城市、港口及海外“西夷”等地的交通线依旧畅通。在原宋静江府各衙署及城南厢的临桂县衙署一带遗址^[40]中，不仅常见周边的永福窑田岭窑、兴安严关窑、桂林东窑的青瓷和仿均釉瓷器，还有来自北流岭垌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的青白瓷，以及吉州窑、建阳窑、景德镇窑、龙泉窑、临汝窑和磁州窑的瓷器残片，足见南北贸易往来的盛况。临桂钱村遗址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圩场^[41]，百色阳圩营盘遗址为北宋晚期的地方军事防御体系^[42]，贺州钱监遗址是宋代冶铸遗址^[43]，北流河流域青白瓷在这些遗

址中的发现，反映了北流岭垌窑、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等窑口的产品已深入各级市场，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商品。

邕州地连大理、罗殿、自杞、特磨和安南。《岭外代答》载，“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44]，说明邕州是连接当时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和交趾地区的重要通道。乾道九年（1173年），有大理“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向宋求取“浮量钢器并碗、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水……等药”^[45]，“浮量钢器并碗”疑即饶州浮梁（江西景德镇）地区烧造的瓷器。结合横山寨博易场旧址中发现不少宋代青白瓷和青瓷残片来看，应有一定的陶瓷器通过横山寨向西南，甚至交趾地区流通贸易。

越南北部与广西接壤，濒临北部湾地区，有海陆交通与我国交流。“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交趾商人自海港出发，遵崖而行，“朝发暮到”，非常便捷。神宗元丰中期设置的钦州博易场，是宋朝与交趾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46]。博易场贸易商品除了文献记载的香料、黄金、沉香、蜀锦、纸、笔、墨、米、布之属，可能还有各地窑场的瓷器。

鹿耳环江口出土的双面刻划花青瓷碗（图6-7），敞口，凸唇，弧腹，圆底，圈足。内壁有篦划及刻花组合纹饰，口沿及内底旋弦纹各一周，外壁划竖线纹。这种内外刻划花，器底修足草率，留有高低不平的旋修痕迹的青釉瓷器，主要见于福建宋代同安汀溪窑系。由于市舶司的设置，这些东南沿海窑场瓷器的发现，可能如《诸蕃志》所载，由福建、广东等地商人“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47]，至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贩回香料等土特产。



图6-7 鹿耳环江口出土的青瓷碗残片

从有限的考古发现来看，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行销广西当地市场，在各级城址、圩场中皆有发现。不过，韦仁义在《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中认为，广西大规模兴起的宋代窑场，其产品远远超出当地居民的需求，应有大批瓷器参与了海路贸易。^[48]

从瓷器品种来看，根据各地的瓷土和技术条件，桂北主要烧制仿耀州窑系青瓷、仿建窑酱釉瓷等，北流河流域烧造仿景德镇湖田窑系的青白瓷。根据海内外沉船和港口遗址的考古发现，耀州窑系青瓷和湖田窑系青白瓷是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深受海外市场欢迎。

海路贸易的需求刺激了国内各窑场的仿制热潮。随着广东的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等仿烧窑场的衰落，广西因瓷土资源丰富、柴薪充足、产量扩大、水路便捷，而成为外销瓷器的供应基地之一。

从贸易辐射地来看，广西的博易场以西南少数民族和交趾为主要贸易对象，其市场需求狭小而单一，不及广州面向的海外市场广阔。交趾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批仿烧中国瓷器的窑址，其产品大多较粗糙，显然以满足当地普通居民需求为主。除生产少量精致瓷器外，统治阶层使用的瓷器大多仍为海路贸易和朝贡赏赐所得，但交州港衰落后，不再承担南中国海与印度洋海上贸易的转运港口，交趾地区对广西地区的瓷器需求量较为有限，加之宋代对海路贸易的管控极为严格，外销产品需经市舶司检验抽解，发给公凭后方可出海贸易。因此，虽然有少量瓷器在交广边境的横山寨和钦州博易场上交易，但广西的宋代瓷器大批出海贸易，只能顺西江而下，赴广州市舶司出海。

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北部湾沿海的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了几件越南生产的仿广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49]这些瓷器均为口沿内折，腹壁斜直，圈足低矮；灰白胎，较粗疏，施青釉，部分釉面有开片。纹饰有模印菊瓣纹（图 6-8:1）和模印缠枝花卉纹（图 6-8:2）两种。泥团支钉垫烧，内底和外底常有支钉痕。圈足常见越南瓷器较为典型的“铁汁”底。根据器形、纹饰、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来看，与越南北部河内、南定省出土的 12~14 世纪的仿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较为相似。^[50]



1. 青瓷模印菊瓣纹碗残片

2. 青瓷模印缠枝花卉纹碗残片

图 6-8 防城港洲尾地区出土的越南青瓷

越南河内、Nam Dinh 省生产的青瓷不仅模仿耀州窑青瓷，还借鉴了广西兴安严关窑、北流岭垌窑、永福窑田岭窑和广州西村窑等仿耀产品的制瓷技术和纹饰特征。这种从胎色、釉色到叠烧技法、纹饰风格等各方面的精心仿制自然不是凭空想象，供其参考的瓷器范本，应该是通过贸易或其他途径获得。由于地域相邻，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我国的瓷器经由北部湾流向了交趾地区，激发了输入地窑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出现了仿制我国外销瓷器品种的热潮。

这些舶来品对输入地的影响并非物品本身的价值高低，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影响。由于耀州窑青瓷行銷世界各地，深受各地人民的喜爱，越南的窑工便试图对其进行仿制，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曾出现过仿制著名外销瓷的热潮，越南当地窑工获得的“耀州窑青瓷”不乏这些窑口的仿制品。面对琳琅满目的“耀州窑青瓷”，他们自是无法分辨，对各仿制瓷器中包含的技术信息和文化内涵亦不能真正理解，只能基于自身的制瓷技术水平和审美对其胎釉、纹饰等外在特征进行仿制。越南窑工们模仿耀州窑青瓷烧制了灰胎、青釉、器底涂抹铁汁的瓷器，纹饰方面虽也选择了较为流行的缠枝花卉纹、唐子纹（婴戏纹）等（图 6-9:1、图 6-9:2），但这些纹饰在我国仿耀州窑系瓷器中均有仿制，只是不同窑址各有特点，因此越南仿制的牡丹纹与广州西村窑较为相似，唐子纹（婴戏纹）的布局结构和纹饰特征则可能来自北流岭垌窑。印花纹碗、盘内壁从口沿下方到腹壁装饰模印菊瓣纹和蔓草纹，口沿内折，用泥块支钉垫烧、圈足低矮、刮削不平均为仿烧兴安严关窑瓷器（图 6-9:3）。越南的仿耀青瓷中还混入了一些北部湾地区青白瓷的元素，如蔓草叶纹青瓷碗内底斜收呈凸起的小圆圈是北流岭垌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等景德镇湖田窑系青白瓷窑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常见器形，少见于青瓷器。这些混合了各窑址特征元素而形成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正是中越两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代表性产物。



图 6-9 越南出土的 12~14 世纪瓷器^[51]

三、唐代北部湾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存

(一) 主要遗存

汉代以后，因行政区划调整、地理变迁、泥沙淤积等原因，合浦港逐渐失去了北部湾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心的地位，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也逐渐西移，而钦州地区的重要地位则日益突显，发展成为北部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海上航运和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相关遗存除上述窑址外，还有钦江故城、久隆古墓群、西坑运河和潭蓬运河等。

1. 钦江故城

钦江故城是南朝至唐代初期安州州治所在，遗址位于钦州市东北 25 千米处的久隆镇沙田村东北，东有钦江往南流入钦州市区注入北部湾（图 6-10）。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2^{\circ} 06' 03''$ ，东经 $108^{\circ} 42' 47''$ ，海拔高度 16 米。1963 年，广东省文物工作队首次踏查了该遗址。1977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实地调查时采集到鎏金铜佛像、莲瓣纹瓦当、席纹陶片、绳纹砖等遗物。1981 年，该城址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 6 月，为配合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遗存调查”，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钦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



图 6-10 钦江故城航拍图

钦江故城保存状况较好，城墙、城门及护城壕形制基本清楚。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200 米，东西宽约 180 米，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城圈基本保存完整，南北城墙

各有缺口一处，应为城门。城墙平地起建，使用版筑法，分段夯筑，阶梯式内收。城墙南北和西面发现护城壕。城内出土遗物多为瓷器，且以青黄釉、青釉为主，有少量酱黄釉。器形以多系罐为主，有少量盖、碟等。从其器形与烧造工艺来看，应为雅子冲窑产品。陶器数量较少，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多系罐、釜、罐和盆等。建筑材料包括瓦当、筒瓦和条砖等。

钦江故城面积不大，与广西浦北施渡坡城址、阳朔归义故城、容县容州古城等具有较浓厚军事色彩的城址相比，其更加注重对内河与外海航运的控制。钦江故城筑于钦江西岸台地，距钦江河道 200 米，城址东北分布有一条长约 300 米的人工河道，巧妙地将北部湾地区南朝至唐初的州县治城与钦江连接起来，通过人工河道入钦江，溯江而上可经久隆深入内河腹地，顺江而下 20 多千米即可漂入外海。《钦江县志》记载了明清时期溯江而上的内河运输：“夏秋有雨水涨，大船可行；春有雨，中船易行；冬间水涸，中小船俱难行，须扒沙开水路，用人力推船上进。”

钦江故城作为北部湾地区南朝至唐代早期羁縻制度下的政治、军事中心，通过人工河道形成的江海一体的航运体系，在对内河与外海航运及海上贸易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久隆古墓群

久隆古墓群是钦州地区酋帅宁氏的家族墓地，分布于大雾岭东麓，北起久隆平心，南至新明石狗坪，延绵达 10 千米。1981 年，久隆古墓群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7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钦州县文化馆调查勘探发现 30 余座古墓，后经钦州市博物馆确认共 36 座。1977 年和 1981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分别在青草、双墩、大沙坡及新明老冯岭等地点清理了砖室墓 7 座，其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墓室较多，另有耳室、壁龛、头龛等，出土器物以隋唐时期常见的青瓷器和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金属器、琉璃、玉和漆器等。^[52]青瓷器皆为轮制，灰白胎，较厚重；器物内外施青釉，外釉不及底，釉色青中带黄，釉面布满细密开片，胎釉结合较差，釉层易脱落；器形主要有碗、碟、杯、钵、瓶、罐、唾壶、提梁壶等。陶器多数为青灰色硬陶，火候较高；少数为软质红陶，火候低；器形有罐、四系罐、钵、釜、带盖小盂等。铜器有铜镜，铜钵、铜盒、铜杯等。金器有发钗、明器金箔币等。铁器有刀、剑、锅、棺钉等。久隆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绿色高足琉璃杯（图 6-11），直口微敛，深腹，圈底。经能谱分析，该器物属高铅玻璃系统，黄启善认为它是由我国的铅钡玻璃发展而来^[53]，但从其类似罗马玻璃杯的造型来看，也很可能是海路贸易输入的舶来品。



图 6-11 久隆古墓出土的青绿色高足琉璃杯

久隆古墓群是了解宁氏家族及钦州地区历史的重要实物材料。历史上在这里发现过两座有墓志铭碑的墓葬，分别为清道光六年（1826 年）出土的宁贇墓和民国九年（1920 年）出土的宁道务墓，两位墓主都曾担任过钦州刺史。唐初，宁氏家族雄踞一方，控制了北部湾沿海的重要区域。墓志中提及宁氏先祖“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参与了对林邑（今越南南部）和高丽（朝鲜）的战争。宁氏先祖从水路“铺舶新墉之江，出寇迤缘之海”，反映了钦州地区在隋唐时期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较为密切的海上交通联系。

3. 西坑运河与潭蓬运河

西坑运河（图 6-12）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东北利用大风江天然河道，依地势高差将大风江水引入，向西南经九河渡、龙眼山、河山框（岭），流向大灶江，经沙头港向西可沟通鹿耳环江、金鼓江、钦州湾、防城港直至越南。其中龙眼山—河山框（岭）段为人工开凿，现存长度约 5 千米，河道宽 10~12 米。

《钦县县志》载：“九河渡，在州东之岭门村侧，距城一百一十五里，东通大观港，西达龙门。”^[54]《合浦县志》卷一《輿地志·河流》载：“大观港有潮西通九河江……相传汉马伏波征交趾时驻军合浦，由外运粮。桓苦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劫之患。遂以昏夜凿白布蜂腰之地，以通粮艘。此河可通龙门七十二径直抵钦城。”^[55]据此路线，从合浦大观港（今大观村）出发，经九河江（九河渡）可至龙门（今防城港龙门镇），上溯可至钦江，以避乌雷（今钦州乌雷村）风浪。其路线与西坑运河沟通区域一致。西坑运河的开通，既躲避了“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劫之患”，又起到了缩短大风江沿岸、合浦地区到钦州湾航程的作用，即“实钦廉舟楫之利”。

潭蓬运河（图 6-13）为唐代晚期镇守越南的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所开凿，在其幕僚裴劄

所撰的《天威遥碑》中被称为“天威遥”，又因工程浩大，人们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完成这一壮举，故当地又称为“仙人壑”。该运河位于防城港市防城港区江山半岛的江山乡潭蓬村，残长约 1.5 千米，渠宽 6~7 米。潭蓬运河沟通了防城港蓬莱湾和珍珠港万松湾，使通往安南的船只无须绕过白龙尾即可直达交趾，既缩短了航程，又避开了风浪，于是舟楫畅通，安南前线的军需粮饷储备不乏。2015 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江山半岛南段的怪石滩海面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时，就发现了数艘近现代沉没的铁壳船，由此可见，在更早使用木船的唐代，开凿潭蓬运河的必要性。



图 6-12 西坑运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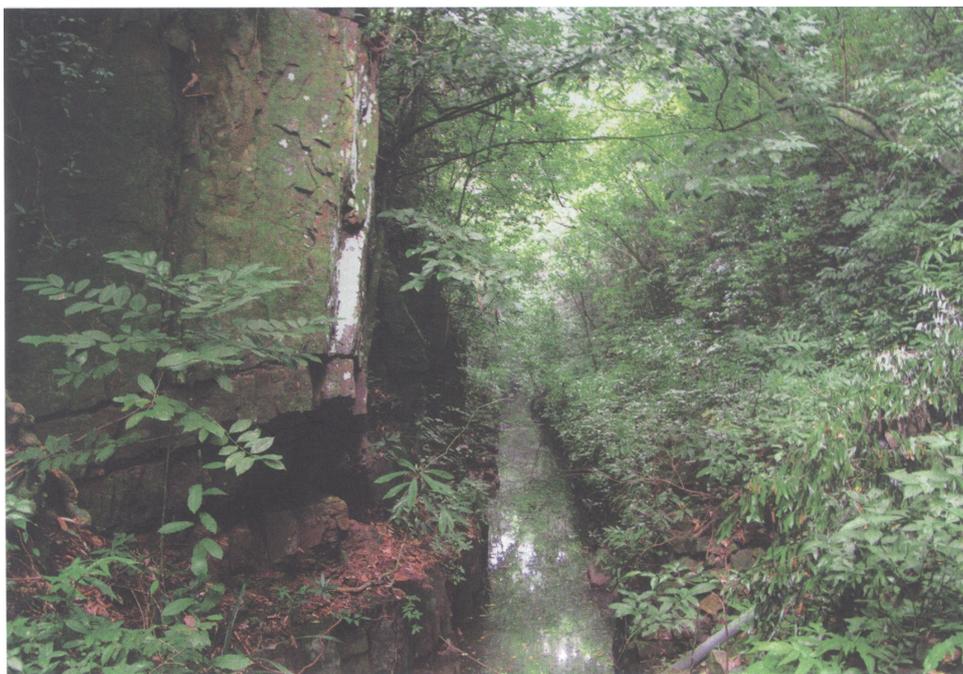


图 6-13 潭蓬运河局部

潭蓬运河开凿年代比较明确，该运河南壁有摩崖石刻“咸通九年三月十三日下手”，表明开凿年代为唐代晚期的 868 年，这在《天威遥碑》中也有记载。可资验证的还有 1982 年村民在运河附近挖出的六系罐、青瓷碗、印花青瓷残片及铜佛手等唐代遗物。^[56]至于西坑运河，《钦县县志》载：“旧传明季海寇杨二鏊为剽劫之所，或曰伏波征交趾时，疏为运粮道。”^[57]西坑运河如此浩大的工程，定非海寇杨二的能力所及，而很可能是东汉初年马援征交趾时开凿的。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率军抵合浦后，“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58]。即从合浦开辟了一条从合浦到浪泊（今越南北宁省境内）长达 500 多千米的沿海交通线，西坑运河及潭蓬运河都应是马援这一时期打算开凿的，不过西坑运河所经为黄土土质，易于开凿，而潭蓬运河所经为海石结构，马援“竟不遂其志”，故才有之后高骈为开凿潭蓬运河上奏朝廷时所言的“稍加疏凿”一说。试想，如果没有马援开凿的基础，潭蓬运河恐怕很难如《天威遥碑》所记，耗时仅半年就完工。

两坑运河和潭蓬运河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构成了广西古代北部湾沿海运河体系。北部湾沿海古运河（图 6-14）的开通，使合浦经钦州湾通向越南的航运更加安全便捷，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航段的安全、通畅，促进了北部湾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这样宏伟而艰巨的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唐时期国家开拓南部边疆的象征。“天威遥”，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仅有的一条海上运河。^[59]如果西坑运河的开凿时间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那么开通广西北部湾沿海运河的年代更可能早至东汉早期。但其开凿的年代，不管是东汉早期，还是唐代晚期，均比世界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至少早 1000 年，其伟大意义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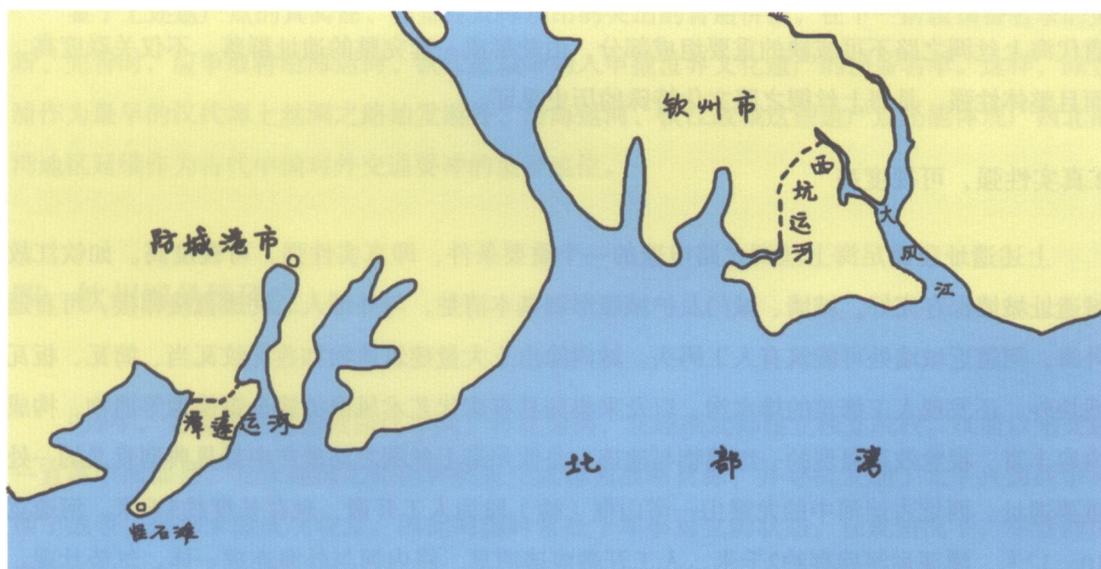


图 6-14 北部湾沿海古运河位置示意图

（二）价值评估

1. 关联度高，整体性强

上述联系密切的遗存，形成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关联度极高的一组遗址群。其中，钦江故城是集城圈、护城壕、人工河道与码头等遗迹于一体的地方行政管理中心，从其地理位置特点上看，其职能包括实施对钦江城外内河与外海的商贸管理事务；距钦江故城不远的久隆古墓群，其墓主人是钦州地区酋帅宁氏家族，他们不仅掌控着当地包括海上贸易在内的地方行政事务，从墓志中还反映出其在隋唐时期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关系；沿海运河的开凿，为海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雅子冲窑址为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大宗产品——陶瓷器的制作中心。雅子冲窑址及久隆古墓群、钦江故城、鹿耳环江口等相关文物点出土的瓷器，形成了一个解读北部湾地区唐代瓷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使用环节”的手工业产业链。这几处遗产点，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遗址群落，不仅关联度高，而且整体性强，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特殊的历史见证。

2. 真实性强，可视度高

上述遗址还满足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一个重要条件，即真实性强，可视度高。如钦江故城遗址城墙保存完好，城墙、城门及护城壕形制基本清楚，与外部人工河道直接相接，可直通外海，河道近城墙处可能筑有人工码头。城内除出土大量建筑遗物如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残块外，还发现人工修筑的排水沟，以及采集到具有唐代艺术风格的鎏金铜佛像等遗物，构成内容丰富、视觉效果强烈的一组遗物与遗迹，是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处重要遗址。西坑古运河中的龙眼山—河山框（岭）段为人工开凿，现存长度约5千米，河道宽10~12米，潭蓬运河残存约2千米，人工开凿痕迹明显，将内河与外海连成一体，气势壮观，风貌独特。

久隆古墓群、雅子冲窑址、钦江故城等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品种丰富，与鹿耳环海湾出土的陶瓷器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表明此地制作的陶瓷器作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直接销往海外；而在墓葬中出土的琉璃高足杯具有明显的两亚风格，很可能是舶来品，这些出土文物和地面遗址共同构成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最具可视性、真实性的历史图景，代表着海上丝绸之路独特的艺术成就和景观范例。

3. 历史悠久，风貌独特

长期以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主要依靠沿海与近海沉船的水上考古发现作为重要支撑，而对沿海岸线的陆上交通枢纽、运河码头、管理机构、商贸集散地等重要遗址的资料掌握不多。北部湾地区的钦州、防城港一带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唐宋时期已基本奠定

了它们在对外海上交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根基。考古发现的上述遗址具有“海陆相连、河海联运”的独特历史风貌，它们门类齐全，不仅涵盖了城址、墓葬、窑址、运河等不同种类，而且各遗址点之间还具有密切的关联度，体现出行政管理、水运监管、陶瓷制作、市贸博易、海神祭祀等不同的功能特色，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中不仅具有极高的相关性、整体性和真实性，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不但对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相互交通、交流与交融的特殊产物，堪称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财富。^[60]

鉴于上述遗产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体现出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下一阶段预备名录的更新、完善时，应争取将沿海运河、钦江故城等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样，除合浦作为最早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外，沿海运河、钦江故城这些遗产点还能体现广西北部湾地区延续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通要冲的重要地位。

四、钦州博易场研究

939年，安南的吴权击败南汉军队，自立为国，在越南北部建立独立政权。汉唐以来交趾一直属中国郡县，北宋建国之初仍将收复交趾作为战略目标，并寻机发动了太平兴国战争和熙宁战争，但均未能成功收复。因此两国时常处于军事对立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尽管两国常有贡赐往来，但宋朝对安南的贸易多有限制，不仅将其排斥在市舶贸易体制之外，而且在边境互市的地点上，也选择便于控扼的廉州和钦州如洪寨。

（一）交州港的衰落与钦州等地博易场的兴起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交州是中国南海重要的海路贸易港口。《旧唐书·地理志》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61]，南海交通频繁之大港，不外乎交、广两州。三国东吴时，统治交趾、合浦的士燮兄弟常向孙权进贡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角、象之珍、奇物异果等^[62]。其部分贡物如琉璃之类应是来自海外。据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所述，当时南海商船东来，大都先舶交州，再转广州^[63]；南朝时，南海各国商船多经交趾泛海入中国内地；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自广州沿安南沿岸行……抵于赤土（今马来西亚）”，南海各国派使节随同回访，“循海北行，达于交趾”^[64]。据《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载，大业六年（610年）洛阳举行中外商品交易会，前来朝贡、贸易的国家颇多，大抵皆是南海中小国^[65]，其中林邑、赤土、真腊、婆利等国均经过交趾进入中原。

唐时越南地属安南都护府，交州港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门户之一，几乎与广州齐名。五代时期安南独立，不仅失去了广阔的内地市场，交州港也不再充当中国贸易港的角色。加之宋代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海路贸易在东南沿海兴起，交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急剧

下降。航海技术的发展，也是交州衰落的原因之一。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使宋代海舶不必再沿海岸线航行，而可以撇开北部湾和安南沿海，直趋马六甲和印度洋；东来蕃舶也能直航中国东部的广州、泉州、明州及青州等港口，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发生联系，交州在中国海上交通中的中转和沿海停泊港口作用逐渐丧失。

交州港衰落后，钦州、廉州随即代之而起。钦州、廉州港湾的交通作用日益突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网络连接的重要贸易港口。加之南宋时期广西战略地位加强，邕管地区境域极广，有溪峒羁縻州、县、峒数十；东可达统治中心江南地区，西湖右江可接盛产战马的大理政权统治地区（今云南和贵州西部），西南与安南为邻，南濒北部湾，渡海则有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再浮海而南，可通占城诸蕃或六合之外。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使这片沿海、沿边地区凭借地理的区位优势，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成为人物荟萃、商品齐聚、国内贸易与海路贸易交织的大市场，兴起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今田东县平马镇）、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今宁明县境内）、钦州博易场等海上贸易口岸。^[66]

（二）钦州博易场的贸易

当交州在中国海路贸易地位急剧下降的同时，西南地区的贸易格局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广西沿海及其与安南交界的沿边地区兴起了一批博易场，成为西南地区国内贸易和海路贸易交融的场所。博易场是宋朝在蛮汉交界地带单方面设置的互市市场，主要贸易对象为周边附属少数民族及小国。宋代设置于沿海港口的市舶司，其职能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凡大食、古逻、闾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67]钦州博易场上的贸易管理则不同于广州、泉州等港口，未置于市舶体系内，而具有军事管理性质，由州监押，沿海巡检兼管。

据《岭外代答》载，钦州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前来贸易的外国人主要为安南人。他们对钦州博易场的依赖程度极高，“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这些商人有“谓之小纲”的富商，另有安南官府组织的贸易团队，即“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同时也有做小买卖的边民，“谓之交趾蟹”。富商和小商贩的贸易商品、方式和规模差距甚远，“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所进行的是远距离贸易；小商贩则“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斗米尺布”，规模较小。^[68]

交趾“所贵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以及海盐、鱼蚌等特产，换回丝织品、纸笔、米布。其中，“金银、真珠、象齿、犀角”皆为交趾盛产。沉香、光香则由交趾商人从海外贩运而聚于钦州博易场。沉香，以产于真腊者为

上，占城次之，“交趾与占城邻境，凡交趾沉香至欽，皆占城也”。光香，由于“气粗烈如焚松桂”，南人买回后，“以供日用及常时祭享”。生香，“所出非一，树小，老而伐之，故香少而末多。其直虽下于乌里，然削木而存香，则胜之矣”。熟香，或即黄熟香，“笺香之类也，但轻虚枯朽不堪者”。还有蝉蚕香，“交趾所贡，唐宫中呼为瑞龙脑”^[69]。另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两国贸易中交趾的商品还有香珠、思劳香、槟榔苔^[70]。交趾商人贩易的食盐，二十五斤为一箩。交趾喜好笔墨，“交人以墨与角砚、鷄笔并垂腰间”。“交趾墨虽不甚佳，亦不至甚腐”，质量尚可，而广西所产墨质次价低，“佳者一笏不盈百钱，其下则一斤止直钱二百”，故商人销售交趾墨时，往往搭售广西墨。来自安南的商品还有绢。据《岭外代答》载，安南使者至钦州，太守以妓乐招待，使者即赠绢给诸妓。钦州人还常持琥珀前往博易场卖与交趾，往往“骤然大富”。广西桂树极多，号“桂海”，桂肉可食，又能入药，枝能发散。桂肉也是钦州博易场常见的交易物品。^[71]

博易场交易之时，大商人之间的大额贸易，首先应向宋朝地方政府申请，即“移牒”。大额贸易一般都是数量相对大、价格相对高、距离相对远的商品。如前所述，蜀商贩锦到钦州，又从钦州贩香至蜀地，每次交易动辄数千串铜钱，还有由交趾贩来或由第三国转口而来的商品，如钦香、沉香等香料，都需“移牒”。其次进行验货，接着进行价格谈判，一旦谈好便不再变更。如经持久谈判仍难达成一致，便需要职业中间人“侏者”从中调和磋商，“左右渐加抑扬，其价相去不远，然后两平焉”。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后，一般由官府川面度量，为之秤香交锦，达成贸易。最后是征税。钦州博易场上只对我国商人征税，蕃商则免。学者杨武泉推测，宋朝政府于东南沿海及横山寨贸易皆对外商抽解并征税，而于此处皆免，盖因其所贩香药珍奇，品质不如广州等地市舶与边贸，便无须抽解。免税实则照顾钦州，以广招海外蕃商前来贸易。“且其征税，约货为钱，多为虚数，谓之纲钱，每纲钱一千，为实钱四百，即以实钱一缗征三十”^[72]，税收远低于宋朝的常规过税和住税。

据载，当时在交易过程中，除了价格较量，还常有互相欺诈的情况发生。宋朝商人有时会提供假劣商品，而且在秤上做手脚，以致交趾先后三次遣使校定博易场所用之秤。而交趾人“则以金银杂以铜，至不可辨，香则渍以盐，使之能沉水，或铸铅于香窍以沉之”^[73]。

（三）钦州博易场在宋代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广西位于西南，蜿蜒若长蛇，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海之南郡又内包黎僚，远接黄支，从海路和陆路皆可通往西南方，乃至海外。钦州博易场通过海路和陆路将广西与域外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联结起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区域贸易中心之一。

据《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载，宋代广西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有三条：一条自邕州横山寨，经古天县、归乐州、唐兴州、七源州、泗城州、古那洞、龙安州、上展、博文岭、罗扶、自杞国、大理国等地，至蒲甘国，蒲甘即缅甸古国；另一条自邕州横山寨，至

七源州分道，经马乐县、恩化县、罗夺州、朱砂蛮、顺唐府等地，至罗殿国；还有一条自邕州横山寨，经上安县、安德州、罗博州、阳县、隘岸、那郎、西宁州、富州、罗拱县、历水铺、特磨道、结也蛮等地，至大理国^[74]。可见，邕州横山寨在当时是广西乃至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和域外交通的一个中心，三条通道皆从此始。这三条道路不仅是云南至邕州各博易场的道路，而且为西南地区构建起了对外贸易的交通网络，将邕州通大理国道与云南至天竺达印度洋的道路连接起来，从而贯通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印度洋与太平洋，成为宋朝和大理国政权对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料是宋代最大宗的海外舶来品。南宋时期，钦州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据《桂海虞衡志·志香》载，钦州博易场上交易的“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带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质重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入药，南人贱之”^[75]。人们对香料品位的认识反映了宋代广西沿海外贸市场形成和交易的繁盛。在交趾商人带来的香料中，不完全是安南土特产，也有部分为利用同海外国家接壤或航海的便利所获取的舶来品，而后转贩于广西各博易场。周去非在叙述广西“海外诸蕃国”时，提及的国家远至斯里兰卡以西的天竺（印度）、大秦（古罗马帝国，约在地中海一带）、大食（波斯湾地区及西亚一带）。虽然目前缺乏确切的资料证明上述国家或地区与广西沿海港口直接通航，但是至少表明该国商人贡使或通过交趾，或经由其他国家辗转与广西沿海发生了联系。

广西博易场均设于沿海或沿边，交易具有明显的内贸外贸交融的特征。虽按周去非所述，各博易场似有分工，如横山寨博易场针对大理买马而设，永平寨博易场面向陆路而来的交趾商人，钦州博易场是滇西海路贸易港口。但以上博易场均集中于广西西南部，距离近者六七十千米，远者不过两三百千米，又有便利的交通道路相连，西南地区前来的商人和海外舶商可在几个博易场内辗转贸易，互通有无。由此，各博易场的内外贸易根本无法截然而分，从而使大理贩马商人、巴蜀丝锦商贩通过横山寨辗转钦州港或永平寨博易场，同那里的海商进行交换和贸易；海商和交趾商人也能来到横山寨等博易场同内地商贾交易。博易场与海港间形成了相互通连的内外贸易大市场。任何参与该市场交易的个人、民族、地区和国家，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国内外贸易。据载，大理人到横山寨的购物清单中，既有产自中原内地的文化典籍、日用器物，又有琉璃器皿、香料、海产药物等沿海产品和海外舶来品^[76]，使得云南通过广西实现了海路贸易。云南境内所产食盐不足以自给，大理对海盐的需求量较大，宋朝在广西购大理马，常以海盐充抵马资。永平寨博易场遵陆路而来的交趾商人，用海盐与中国交易布匹，形成了交趾商人以海盐同广西人交易武缘布，而广西人又用海盐同大理交易马及各种蕃夷特产的贸易网络。作为南诏、大理地区流通货币的海贝，也可以在广西博易场得到。

因此，设置于广西沿海或沿边地区的博易场，发挥着西南地区内外贸易集散地的作用，

带有强烈的对外开放特征。其经济联系面和影响力覆盖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整个西南地区，波及东南亚地区和海外国家，具备了区域中心市场的特点，构成了西南地区开放型的内外贸兼容的市场体系。^[77]

- [1] 陈炎：《丝绸之路的兴衰及其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原因》，载《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5-27页。
- [2]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第65页。
- [3]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5（2003重印），第1146、1147页。
- [4] 三上次男：《从陶磁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 [5] 航线示意图可参见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86页。
- [6]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5（2003重印），第1146、1153-1154页。
- [7]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2006，第4、55页。
- [8] 同上书，第86、91、99-101页。
- [9] 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10]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 [11]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0期。
- [12] 夏秀瑞、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第137、203页。
- [13] 周华、李铎：《广西唐代青瓷窑的兴衰》，载《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118-126页。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防城潭蓬出土唐、元、明代文物》，《考古》1985年第9期。
- [15] 桂林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 [16] 曾广亿：《广东潮安北郊唐代窑址》，《考古》1964年第4期。
- [17]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杨少祥：《广东梅县市唐宋窑址》，《考古》1994年第3期。
- [18] 王普生：《广西宋代瓷窑装烧工艺的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2012，第3页。
- [19] 郑超雄：《广西宋代窑瓷初探》，《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韦仁义：《广西古代陶瓷综述》，《民族艺术》1990年第2期。
- [20] 陈小波：《广西桂平古窑址调查》，载《中国古代窑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调查》，《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桂平宋代瓷窑》，《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 [2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局：《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局：《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
- [23]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第11期。
-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容县城关宋代瓷窑》，《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集。
- [25] 彭长林：《北流市岭垌窑宋代窑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
- [26] 韦仁义：《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载《中国古代窑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 [27]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调查》，《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 [28] 钦州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灵山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钦州志》，陈秀南点校，灵山县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1990，第73页。
- [30] 蒋廷瑜：《北海一座唐墓》，载《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337-338页。
- [3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015广西防城港海域水下考古调查评估报告》，内部资料。
- [32] 周华、李铎：《广西唐代青瓷窑的兴衰》，载《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118-126页。

- [33] John Stevenson, John Guy,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 1997), p.184.
- [34] 黄慧怡:《唐宋广东生产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35] 钦州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 [36] 马文宽:《伊斯兰世界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汪勃:《再谈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考古》2012年第3期。
- [37] 李铎、封绍柱、周华:《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
- [38] 刘凯等:《柳州:风情港正南门城墙遗址考古发掘硕果累累》,《广西新闻网-南国今报》2017年7月13日,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70713/newgx5966a6c2-16350552.shtml>, 访问日期:2017年7月13日。
- [39] 马文宽:《伊斯兰世界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91页。
- [40] 陈桂芬:《我市中山中路发现宋代水井群》,《桂林文博》1997年第1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市东华路流觞石刻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97年第1期;黄章智:《流觞时刻年代置疑》,《桂林文博》1998年第2期;李铎、刘烈辉:《景德镇陶瓷对广西的输入和影响》,《景德镇陶瓷》第三卷第1、2期。
- [4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临桂县钱村遗址发掘简报》,载《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第389-411页。
- [42] 李珍、刘康体:《百色市阳圩宋代营盘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
- [43] 彭书琳、陈左眉:《广西贺州市铁屎坪钱监遗址的试掘》,《考古》2006年第8期。
- [44]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2006,第122页。
- [45] [南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第257页。
- [46]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2006,第4、55、196页。
- [47] [南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第217页。
- [48] 韦仁义:《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
- [49] 防城港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 [50] 西野范子:《模仿陕西耀州窑系与广西严关窑青瓷的越南陶瓷——以河内郊外Kim Lan遗迹、Nam Dinh省出土资料为中心的分析》,载《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2009,第97-130页。
- [51] John Stevenson, John Guy, *Vietnamese Ceramics:A Separate Tradition*(Chicago: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1997),p.227、229、233.
- [52] 韦仁义、佟显仁:《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考古》1984年第3期。
- [53] 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
- [54] [民国]陈公佩、曾传仁、孔繁枝修,陈德周总撰《钦县县志》,钦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影印本,2010。
- [55] [民国]廖国器修《合浦县志》卷一《舆地志·河流》,民国二十年版。
- [5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防城潭蓬出土唐、元、明代文物》,《考古》1985年第9期。
- [57] [民国]陈公佩、曾传仁、孔繁枝修,陈德周总撰《钦县县志》,钦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影印本,2010。
- [5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846页。
- [59] 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鏞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2010,第598页。
- [6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遗址调查与试掘报告》,内部资料。
- [61] [北宋]欧阳修:《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2002重印),第1750页。
- [62] [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59(1982重印),第1192-1193页。
- [63]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88,第31页。
- [64] [唐]魏征:《隋书·南蛮》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3(2008重印),第1835页。
- [65] [清]阮元修、陈昌齐等:《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66] 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

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2期。

[6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第八十六册，中华书局，1957（2012重印），第3364页。

[68]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96-197页。

[69] 同上书，第241-248页。

[70] [南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第45-47页。

[71]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202、226、264、287页。

[72] 同上书，第197-198页。

[73] 同上书，第197页。

[74]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22-123页。

[75] [南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第40页。

[76] [南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第257页。

佚文原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四裔六南诏》后，胡氏辑于该书。

[77] 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18卷第2期。